

# 忽必烈



通俗军事文库  
中华名将系列

李鹏贵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通俗军事文库 / 中华名将系列

# 忽 必 烈

李鹏贵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目 录

- 一、穹庐英才 ..... (1)
  - 二、治理漠南 ..... (10)
  - 三、奔袭大理 ..... (17)
  - 四、统军征鄂 ..... (24)
  - 五、继承汗位 ..... (33)
  - 六、南北平叛 ..... (43)
  - 七、挥军灭宋 ..... (55)
  - 八、亲征叛王 ..... (70)
  - 九、出兵邻国 ..... (82)
  - 十、别世留名 ..... (94)
- ★附录
- 忽必烈生平大事年表 ..... (97)

13世纪初，蒙古高原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杰出的蒙古族首领铁木真（成吉思汗）顺从民意，统一了星罗棋布的大小部落，建立起大蒙古国，结束了长期互相掠夺、仇杀的混乱局面。成吉思汗依靠迅速发展壮大的军事力量抗击民族压迫者，东征西讨，广扬武威，蒙古民族进入空前繁荣发展时期。

就在成吉思汗忙于征伐之际，他的孙子、一代英才忽必烈（蒙语之意为“分配一份子”）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出生于达里泊（今内蒙古达拉特旗）老小营。当时，在攻金战场上的蒙古军队，已占领了金中都（今北京），取得决定性胜利。成吉思汗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漠北大营，得知又添了个孙儿，双喜临门，欣喜异常，叫人把忽必烈抱给他看。他注视着令人喜爱的孙子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即忽必烈母亲唆鲁禾帖尼），让她把他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于是，忽必烈的母亲遵旨把他交给唐兀惕部的一个年轻奶妈撒尼黑精心照料。

忽必烈的父亲拖雷、母亲唆鲁禾帖尼，是蒙古族历史上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对忽必烈的成长有着直接、良好的影响。

拖雷，是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

个儿子。他跟随父亲攻金、灭西夏，占城夺地，屡建功勋，还曾单独领军攻入西域呼罗珊。史书说他在战争中常打胜仗，“没有一个宗王像他那样征服过如此多的城市和国家。”成吉思汗认为拖雷有勇有谋，武功超群，是立国定天下的人，故常称他为那可儿（伴当），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按照蒙古族的习俗，对幼子特别照顾，不仅分配军队、封地时要加以优待，就是汗位也应传给幼子。因此，成吉思汗总是让拖雷留在身边，继承所有在斡难河及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畔的斡耳朵（宫帐）、牧地及军队。在挑选汗位继承人时，也曾透露出让拖雷继位的意思。后来，只是考虑其所负责任太重，才征得诸子的同意，确定由三子窝阔台继承。

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故后，拖雷监国，帮助窝阔台继位称大汗。太宗三年（1231年），他遵父遗策率军借道宋境，在均州（今河南均县）三峰山地区采取以逸待劳、乘大雪围击的战法，以少胜多，歼灭金军主力，再立大功。一年后北返途中，窝阔台汗生病，拖雷为让其兄早日痊愈，代兄喝下巫师给予的“圣水”，不久死去。而窝阔台却恢复了健康。此事虽是巧合，但在当时蒙古贵族敬畏神灵的情况下，拖雷的行动不仅使窝阔台十分感激，也使诸王乃至广大民众为之敬佩。

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罕的兄弟札合敢不的女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

部时，击败克烈部，俘虏了札合敢不的三个女儿，留大女儿做自己的妻子，把二女儿给了长子朮赤，把老三唆鲁禾帖尼给了拖雷作为正妻。

唆鲁禾帖尼是一位聪明能干、杰出的女性。她生有四子，即蒙哥（元宪宗）、忽必烈、旭烈兀（伊利汗国创建者）、阿里不哥。由于拖雷早逝，窝阔台汗把拖雷在世时所有的权力都交付给她。唆鲁禾帖尼依靠自己丰富的智慧和坚定的性格统领所部将士，以精明、谨慎的态度，处置军国要事，博得窝阔台及诸王的信任和崇敬。

窝阔台汗曾在拖雷去世后，要从其军队中抽调2000人交给自己的儿子阔端。那些万户长（带领近万人的军事长官）、千户长对窝阔台的做法表示不满，当着唆鲁禾帖尼的面说：“这两千人，按照成吉思汗的诏令是属于我们的，而窝阔台汗把他们给了阔端。我们怎能允许此事，而违背成吉思汗的诏令呢？我们要向大汗说明情况。”唆鲁禾帖尼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冷静地劝导大家说：“你们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继承的和自己取得的财产已很富足；军队和我们，同样都属于大汗。他所作出的决定，肯定有他的理由，我们要服从他的命令。”于是，诸将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她的劝告，避免了一场内部冲突。

唆鲁禾帖尼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准他们为小事争吵，还教育他们讲究德行和礼貌。她把培养好子女作为自己毕生的宏愿。她晚年与幼子阿里不哥

生活在一起，常把帐幕设于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元宪宗二年（1252年）病逝。

忽必烈在祖父、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和淳淳教导下茁壮成长起来。当时，蒙古人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以万户、千户、百户、十户为单位组成。各级长官严格管理所属人员，下级服从上级，各级绝对听从大汗号令，“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练习箭术和骑马打猎是男子人人必须具备的本领。故男孩刚刚两岁时就开始练习骑马，同时大人就把适合的弓箭交给他们，教他们射箭。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他们就会变得敏捷而勇猛。射猎是蒙古人解决食物的必不可少的生产手段，也是训练军队、提高战力和培养后备力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平时狩猎完全按照战时的方法进行，七八岁以上的孩子即要参加这些活动。忽必烈当然也不例外。

他从孩提时起就和弟兄们一起，骑马射箭，奔驰在千里草原上。10岁时就成为能猎取小动物的骑射能手。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春夏期间，成吉思汗西征后班师，留守在蒙古后方大斡耳朵的许多亲属都远道西行，前往迎接。当成吉思汗率大军到达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畔时，见到亲人们早在那里迎候。特别使他高兴的是两个孙儿忽必烈和旭烈兀带着猎物等待他们主持庆贺典礼。这也是蒙古民族的传统习俗，孩子第一次射到猎物，要举行隆重仪

式,让长辈用猎物的鲜血擦在拇指上,以此表示庆贺和祝愿。

碰巧,在成吉思汗到来前几天,年仅10岁的忽必烈射得一只野兔,年龄稍小的旭烈兀射得一只山羊。他们两人见祖父风尘仆仆而满面喜悦地下得马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了上去。忽必烈更懂礼貌,亲热地上前搀扶祖父,并讲了些祝贺的话。成吉思汗见忽必烈小小年纪,武艺非凡,且很懂礼仪,尊敬长辈,故对他尤为喜爱。不顾旅途疲惫当即为孙儿们主持了蒙古人特有的隆重仪式,将猎物的鲜血涂在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手指上。

据传,成吉思汗逝世前夕还惦记着孙儿忽必烈。他对站在身边的亲属说:“忽必烈孙儿虽年幼,但出言不凡呀。你等应当遵其言而行,日后望他能如我一样据宝座,必致天下于安乐之境。”当然,此传说不一定真实,但反映了蒙古民众如同崇拜成吉思汗一样,对忽必烈寄予莫大的期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忽必烈不满足于骑马射箭的游牧生活,他在母亲唆鲁禾帖尼的教导下,逐渐注意学习各种知识,关心时局大事。

元太宗六年(1234年),蒙古军在南宋军队的配合下攻灭金朝,占领中原广大地区。蒙古统治者为了培养继承人和掌管军政的人才,注意搜罗有才识的汉族儒士去漠北教授贵族子弟,其中僧徒、道人、医士、通译人员更受器重。那些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蒙古



贵族青年，也都乐于吸收中原的儒学思想和先进生产技能。

“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更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深信蒙古民族的崛起必将成为中国的主宰，但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要治理中国必须学习中原王朝丰富的治国理军经验。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借助汉人势力才能与蒙古诸王抗衡，才能使自己登上蒙古贵族的政治舞台。于是，忽必烈于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前后，在其所住的漠北地区广揽人才，建立幕府。

忽必烈得知燕京（今北京）庆寿寺有位禅学大师海云，很有学问，曾被成吉思汗称呼为“小长老”，就派人召他去漠北讲道。海云是河东岚谷（今山西岢岚）宁远人，金宣宗赐号通元广慧大师。蒙古军攻克宁远，海云被俘，受到成吉思汗优待。他得到忽必烈召令后启程北行，路过云中（今山西大同）闻南堂寺中有个年轻和尚子聪博学多才，就约他一起前往。

忽必烈见到海云大师非常高兴，厚礼相待，隆重设坛，请海云讲解佛法的重要内容。海云理解忽必烈的心意，说了为人和理政方面的道理。他告诉忽必烈应善于总结过去的得失，要重用贤士而疏远不正之人，要以尊重君主、爱护民众为先。最后海云说：“佛法之要，孰大于此。”他说此话，无疑是为了引起忽必烈对治道的高度重视。

海云又介绍了子聪和尚，忽必烈得知子聪学识

渊博,天文、地理、律历等无不精通,十分欣喜。故在海云大师辞别时,恳留子聪继续在身边讲道。子聪,即刘秉忠,字仲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后来成为辅佐忽必烈理政的重要谋臣。

自那以后,许多汉族儒士应召陆续来到漠北藩府,为忽必烈论古谓今,传授治道。其中有云中怀仁人赵璧、曹州东明(今河北东明南)人王鹗、真定栾城(今属河北)人李冶、广平肥乡(今属河北)人窦默、冀宁(今山西太原)交城人张德辉、邢州沙河人张文谦、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姚枢等。

忽必烈在漠北藩府的7年中,与儒士们在一起谈古论今,有时竟通宵达旦。一起出猎,在马上边走边谈,甚至忘记饮食。有时儒士们还直接上书言事,就忽必烈最关心的问题,运用儒家思想观点来解惑答疑。

忽必烈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对此,儒士李冶认为,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有法度、明职责、纳贤士,则治;反之,无法度、不负责、用小人,则天下必乱。总之,治道不过立法度、正纲纪而已。另一位儒士窦默则认为,应按照三纲五常的传统办法去行事。忽必烈听后表示赞同,说:“人道最重要的莫大于此。失此,则难以立于世呀。”姚枢则写了数千言,具体地回答了忽必烈有关治道的询问。他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归纳成八目、三十条。八目,即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三十

条”列举了立省部、班俸禄、定法律、设监司、修学校、重农耕、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布屯田、广储蓄，等等。姚枢的这些识见，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他后来每遇到问题必找姚枢询问，求得满意的解答。

谈论到如何当帝王问题，刘秉忠在奏文中明确指出，作为天子应以天下为家，视民众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又说皇帝要授任的人，在内莫大于相，因为宰相要领百官，管万民；在外莫大于将，因将要统三军，安四域。要使内外将相互相协调。对帝王来说，国家要务必先处理好此事。当然，天下之大非一人全能管理，应当选择开国功臣子孙，担任各地监守，督促当地官员按皇法行事。这样，就能安定天下，而皇帝无需费很大的力气。刘秉忠的话给忽必烈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忽必烈也很注意了解将相人才的情况。他曾问李冶对唐朝大臣魏征和宋朝大将曹彬有何看法。李冶赞扬魏征忠诚耿直，曹彬不妄杀人，认为他们是大臣、将帅的典范。忽必烈领会李冶的意思，进而问道：“今天，像魏征、曹彬那样有贤才的人有吗？”李冶知道忽必烈求才心切，当即笑答道：“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就是这个理。”接着，他列举了许多贤士的名字，说得忽必烈频频点头。

说起用人之道，刘秉忠作了形象的回答，他说：“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

忽必烈虽知当时谈治国理军之道，只是空论而已。但他坚信自己将来定能有为于天下。他在与王鹗交谈时就明白地显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确实，忽必烈在漠北藩府时与汉族儒士谈论中所学到的治国理军之道，既促使其下定施行汉法的决心，又为其称帝后确立一整套治理国家的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治理漠南

按照蒙古国惯例，各宗王都有自己的封地。宪宗元年（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后，就把漠南汉地划给忽必烈，要他像其他宗王一样掌管该地的军、政、民大权。

忽必烈奉诏后，宴请常与自己谈古论今的各方贤士及宿卫将领。宴会之前，与会者纷纷向忽必烈祝贺，惟有姚枢坐在那里没有表示。忽必烈感到纳闷，知道姚枢必有话要说，就主动问他：“诸臣都争着向我庆贺，惟你一言不发，是何缘故？”姚枢答道：“今国家境地之广、人口之多、财赋之丰，有哪里比得上漠南汉地？如汉地军民之权你都掌管，那大汗还有何干？若将来有人谗言，大汗必会后悔。不如只执掌兵权，所需之财赋可通过诸司取之。这样，就可以势顺理安。”忽必烈觉得在理，夸奖姚枢深谋远虑，故呈报蒙哥汗，仅受命掌管漠南汉地军国事务。

那年秋天，忽必烈带着大批军政人员南下，进入漠南，在水草丰茂的金莲川（即瓜忽都之地，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地区）建立藩府。他充分运用多年广学博采的治理之道，成功地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漠南汉地，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今内蒙古、河南、河北及陕西广大地区，大部为金国故土。由于多年战乱，民众的财产遭到很大破坏，“民无依恃”，“军无纪律”，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安，广大百

姓苦不堪言。

忽必烈一到金莲川，就遇到两件难忘的事。一是辖地邢州（今河北邢台）有两个蒙古贵族反映，那个地方原有民众万余户，现已大部逃亡，只剩下六七百户，请求派良吏去治理。二是奉蒙哥之命在燕京（今北京）管理财赋的断事官牙鲁瓦赤、不只儿等人强势欺人，一日内就斩杀 28 人。有一盗马者罚打后释放，后为试刀又随意拉回斩首。忽必烈得知，责问说：“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无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问得不只儿等无言对答。

忽必烈遇到的这些事，加上南来时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深感该地区问题之严重。他想到谋臣郝经曾说过，“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实则无有。”所以，他就抓住立纲、整军、理财等要务，大刀阔斧地加以整顿。

他知道，地处南北要冲的邢州是漠南汉地中的重灾区。除了当地贵族，在藩府工作的邢州人张文谦和刘秉忠也报告了该地的腐败状况。他们说：“今民生困弊，邢台为甚。应该选择能干的官吏去整治。责成其做出成效，然后令其他各地按法而行。那么，您管辖之地定能改变面貌。”

于是，忽必烈决定先从整顿邢州入手。他命近侍脱兀脱、张耕及尚书刘肃、侍郎李简等人担当此重任。他们几人到了邢州，发现当地许多蒙古贵族只知

花天酒地，欺压百姓，而“不知抚治”，致使田园荒芜，恶少横行，民众大批逃亡。所以，他们协力同心，严明法纪，惩办贪官，整肃军纪，整顿驿站，兴办冶炼，奖励流亡者回乡。没有多久，该地秩序大有好转，民众纷纷返乡生产，财赋日益丰富。

治理邢州的显著成效，使忽必烈坚定了治理好漠南汉地的信心，亦为其提供了以汉法理政的实践经验。于是，他又陆续向河南、关中、陕西等地派出得力官员，按其旨意去治理。

当时，河南也是问题成堆的地区之一。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忽必烈征得蒙哥汗同意，在汴京（今开封）设立经略司，以具有文才武略的汉人史天泽、赵璧、杨惟中为经略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他们赴任后，首先打击了贪赃枉法、受贿作恶的万户刘福，继又杀了恃强欺人、霸占民女30多人的董主簿，民心为之振奋。然后，他们明申法纪，奖励农耕，重用贤才，建立保甲。这样不出一二年，河南各地出现了民众安居、五业兴旺的局面。另外，派往陕西及其他地方的官员也尽责尽职，积极推行忽必烈的整治办法，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哥汗想再给忽必烈一处封地，要他在南京（今开封）、关中两处选择一地。忽必烈征求谋臣姚枢意见。姚枢说：“南京地区，黄河常泛滥而改道，土薄水浅，多生咸草；不若关中为好，那里土地肥沃，古有天府陆海之称。”于是，经蒙哥汗

同意，忽必烈又得了关中封地。

是年夏天，他下令在京兆（今西安）建立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另有博学多才的儒士姚枢、许衡同往辅佐。他们去后，仿效治理邢州的办法，惩办贪官污吏，招纳贤良名士，规定薪水俸禄，减免租税杂捐，鼓励农耕，制定规章制度。仅一个多月，就大有成效，使该地面貌一新。

忽必烈在派人到各地整治的同时，下令收缴了漠南地区前代大汗赐给宗王、诸侯的牌印，取消了他们的特权，并建立统一法则，使大家有据可依，加强了对其封地内的统一管理。

在军事方面，忽必烈首先整顿当地驻军纪律，要求诸将各守其职，领所部驻戍要地，不准在大城中建造私宅，严禁侵占民众利益，禁止杀掠，从而改变了战后“军无纪律”的状况。

其次，重视加强战备。当时，在四川方面有总帅汪良臣在那里筑城、屯田，进行攻蜀的战前准备。在江淮方面，万户张柔奉命镇守亳州（今属安徽），打通亳州至汴京的粮道，并命部将张信分兵驻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防御宋军。忽必烈为了使关中地区驻军与四川、江淮方面有机配合，组成完整的防线，同时也为攻宋作准备，经蒙哥汗同意，于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在汴京建立经略司，命史天泽、杨惟中的人在治理政务的同时，抓紧备战。

他们派出一部分军队与当地民众一起，在唐（今



唐河)、邓、申、裕、嵩、汝(今临汝)、蔡(今汝南)、息(今息县)、亳、颍诸州屯田,发给农具、耕牛,要求“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并在邓州设立屯田万户府,加以统一管理。又下令在西起邓州,东至陈州(今淮阳)、亳州、清口、桃园(今江苏泗阳西南)一线与南宋接壤之地,加筑城堡,分兵镇守。

再者,注意了军饷的储备。忽必烈改变过去以征收银帛代替粮饷、避免长途转运的办法,命民众就地缴纳税粟,消除了粮饷难征的现象。为及时转运和储存粮食,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立都运司,并于黄河岸边建筑粮仓,保证军粮的供应。他还奏请蒙哥汗把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盐池划归其管辖,以保证所部兵马食用。

忽必烈在政治、军事上一系列措施的成功,不仅得到封地内贵族、民众的拥护,巩固了对辖地的统治,而且在宗王和军事将领中树立了威信,从而为他后来登上蒙古国的军政舞台,继承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初创基业的成功,加之汉地习俗的影响,使忽必烈决定改变游牧民族帐居野外的生活。同时,他亦考虑为了加强对中原的统治,需要像中原皇帝那样,建立能起到政治、军事中心作用的都城。元宪宗六年(1256年),他命谋臣刘秉忠负责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建筑宫城,要求3年内竣工。